

美国大学

运作和未来

[美] 雅克·巴尔赞 著 孟醒 译

Jacques Barzun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How It Runs, Where It Is Going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Jacques Barzun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How It Runs, Where It Is Going



美国大学

运作和未来

[美] 雅克·巴尔赞 著 孟醒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大学：运作和未来 / (美) 巴尔赞著；孟醒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5

书名原文：The American University: How It Runs,
Where It Is Going

ISBN 978-7-308-14387-5

I. ①美… II. ①巴… ②孟… III. ①高等学校—教
学研究—美国 IV. ①G6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2954 号

美国大学：运作和未来

[美] 雅克·巴尔赞 著 孟醒 译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赵波

营销编辑 李嘉慧

装帧设计 卿松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10千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387-5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0571) 88925591；<http://zjdxcs.tmall.com>

致约翰·W. 加德纳
以友谊与敬意的名义

在事物的天性中，伟大与统一
密不可分；优秀意味着存在一个中心。

——约翰·亨利·纽曼

导论

ix

赫伯特·I·伦敦

这是我非常想说的一些话。《美国大学》出版于1968年，现在仍然是相关主题中最为明晰而具有信息价值的作品之一。雅克·巴尔赞以他敏锐的洞察力描述了大学及其本质属性。他将古代——也许也是更为宜人的——大学，和出现于他所在的20世纪60年代——作为教师和管理者的——大学作了区分。他的远见卓识带领读者走过60年代“改革”的雷区，怀着对一所学校未来的希望，那是他为之贡献了自己全部职业生涯的地方。我十分钦佩他的见地和分析能力。不过，即便是巴尔赞也没能完全预见60年代聒噪的激进主义中出现的极端情况，他没想象到成为校园正统的包容观念会产生怎样的消极影响。

对于希望了解自己职业本质或大学生活微妙之处的学者来说，《美国大学》是一本必读书。这是一本入门读物，介绍年轻煽动者倒行逆施的呼吁。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所透露的智慧，能够引学院管理者前进，赋校长以勇气。对我而言，

最显而易见的是雅克·巴尔赞对教学和学习过程的好奇和热情。阅读这些段落，便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些现已年逾知命的前学生们，在谈到自己的年级时仍然津津乐道，因为这就是他们曾经的样子，而他的观察也保留着这种意境。希望这本书能够得到再一次甚至更多次的重视，它有被反复阅读的价值。

在此我想要做的，是给出我在深思熟虑后得出的，对美国大学现状的意见。借着这个独特的机会，我可以把巴尔赞对40、50、60年代的判断，与高等教育中的后续事件和表现进行比较。

巴尔赞认为大学生活有个明确的分界：有个与我们的时代相比，兴趣更加简单而温和、不那么狂热的时代，那时判断上的错误可以不用发起什么壮举就得到更正。在那个不如现在复杂的时代，大学不承载积极的行动方针或者清算过去的错误，也不会涉及政府的利益，不会为了满足政治激进团体的要求或解决社区的问题而重新设计课程，也不会被当作是解决问题的首要机构。用现在的眼光看，把大学说成是一个离开“现实世界”的坚固避难所，是多么乏味的事。

那个纯真时代里的校长，如巴尔赞所言：“与七十甚至七百个人打交道易如反掌，可以轻松处理他们偶尔才出现的需求，非常清楚地知道过去发生的和现在自己正在做的，以作为日后的参考。”而现在，校长的角色已经被重构为一个交涉者，他与委员会打交道，与机构代表和法律顾问协商。他手下教员的需求没有限度，还通常是以“无法协调”的恼

人方式提出的——这是由学生激进分子首先促生的大学生活特色。校长的首要任务是在各种冲突的利益面前保持校园的平衡，其成功通常取决于在任期内避免麻烦的能力。因此，现在的校园里没有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olas Murray Butler）这样的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巴尔赞教授相当准确地区分了新旧，但不无反讽的出版年份 1968——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暴动的那年——却抵消了所有对“后现代”时期大学生活的分析。在这个时代里，巴尔赞笔下的趋势得到了确立，一种绝望而非理性情绪的雏形在课程安排和大学范围的实践中得到了体现。

在改变大学面貌和引入“一种新的管理模式”上，战争和萧条、政府干预和先进技术都发挥着作用，随着社会变化，大学也发生了系统性的改变。在应对官僚式复杂问题之变动上的无能，迫使大学官员在日常事务上作出改变：从基于个人接触和理解的社群，转变为基于合同和规章的社会^①。齐普斯先生（Mr. Chips）被佩里·梅森（Perry Mason）取代。大学陷入了根本性社会变革的漩涡之中，它从约 1968 年起开始出现，一直持续到如今。 xi

大学接受改革风潮的重塑是个公认的关键问题，但是因为时机和事件冲击的原因，巴尔赞教授对此只进行了部分的研究。20 世纪的大多数时候，哪怕追溯到 19 世纪约翰·霍

^① 这组术语出自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社群和社会》）。

普金斯和斯坦福建校的时候，创校者都会明确表明建校的目标和目的。知识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知识的基础基本上不会受到潮流的牵连。虽然关于课程和学术自由偶尔会出现争议，但改变的速率是缓慢的。

60年代之前的改变缓慢之原因，是大学生活的单一重心。教学和科研，学习和研究，构成了教师-学生的状态。大学改革思想中，对重塑社会的乌托邦式的尝试还没有出现在人们视野当中，大学也还没有成为现实判断和社会公义的奴仆。管理者还没有堕入到符号是解码工具而词语像肥皂泡一样被解构的兔子洞里。思想的价值也没有被种族、阶级、性别和第三世界意识形态编织的筛网过滤。第十四修正案中没有写入学生权利，而代替监护人 (*loco parentis*) 还是被禁止的。研究者也不用努力完成华盛顿方面的目标，而使自己的项目得到政府资助。更没有多少学生被这样的观念说服：理性的言辞本身就是保持屈从的方式。

在“新时代”里，通过大学教育而改变经济地位的可能性，转变成作为机会平等一部分的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大学成了柏拉图的民主范式：它对任何人开放，而个人无须承担相应责任或达成先决条件。在19世纪，哈佛校长查尔斯·艾略特 (Charles Eliot) 说过，哈佛拥有如此多知识的原因，是新生带来了许多，而毕业生带走了很少。如今，在大多数学者和 SAT 成绩上所反映的则大相径庭——新生知道很少，却以为自己知道很多，而毕业生在很少的事情上知道很多，却不知道应该记住还是遗忘它们。

每个人确实都有大学上，却无人追问是否每个人都应该上大学。标准降到了最低的共同标准，大学玷污了对卓越的追求。成绩得不到区分就是这个趋势的一个明确表现。我从1976年开始就不再使用我所管理学院的院长嘉许名单(Dean's List)，因为它跟学生名册已经没什么区别了。学院中对政治目标的追求有增无减。大学管理层口口声声谴责种族问题，考虑到这一点，他们在努力解决黑人、西班牙裔、美国原住民及其他指明的少数群体学生人数问题上处心积虑，这让学院和大学降低了录取标准。公平、正义、权利平等的炸药包让大学领导被迫通过分类、专断和不公平来进行管理。管理者在发放经济援助时不再只以需求作为标准，他们被迫在计划中加入种族因素以满足政治期许。因此，一个来自富裕黑人家庭的学生能得到奖学金，而中产阶级的白人学生得不到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样的行动所产生的结果，是群体间频繁的诉讼和长期的隔阂。不无反讽的是，整合校园的行为引起的却是分裂。随着种族成为一切决策的中心标准，黑人学生开始不合理地排外、挑剔，有时候甚至被允许拥有单独的住宿空间和餐饮设施。在瓦萨学院1991年的毕业季中，黑人学生还有单独的毕业典礼，他们穿戴的兜帽上印着非洲自由三原色（红绿黑），而不是瓦萨校色。这些特别装饰过的兜帽是用全体学生资金里的钱购买的。

xiii

为了协调校园里的各种兴趣和学生不同的才能和资质，大学开设了所谓的课程超市。课程有难有简；有些迎合种族

和性别，有些毫无意义；有些有价值，有的简直是“芝麻街”的未成熟青少年版。随着学院的目标越来越宏远，课程目录也越来越厚。现在不仅是每个人都有大学上，每个人都有课上了。学生不再阅读那些能让个人从浅薄、狭隘、有限的视角中得到解放的文本，新文化的化身主张的文本只是对已知的强化学习，或是在政治上能得到认可的内容。

多数大学学生都没有读过西方文明，或者任何文明的名著，是科学和数学上的文盲，甚至不能在辩论和写作时形成符合逻辑的论述，这些都已经是老生常谈。在彻底的平均主义风气，不加区分的思想超市，以及激进的日程安排的冲击之下，大多数大学毕业生都“被训练得无能”[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语]。被《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的成功所震惊，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教授询问我是否能为该书惊人的销量做个解释。考虑到大多数人不读尼采，而这是本书的第二部分，又考虑到严肃哲学不会上畅销书名单，我认为很多家长对他们受过大学教育的子女的学术扯淡(psychobabble)感到迷惑，也受够了小资和庸俗的帽子，就愿意花20美元看看自己每年花的25000美元都打了什么水漂。布鲁姆教授会意地点头。

专业学术研究的传播如今过于神秘，以至于一般人不可能知道专业术语的意义，这让知识成了一种神秘主义或启示的真理。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一名教研员自诩“后现代符号学导师”。在听了他的讲座

之后，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热衷于用语言和词义故弄玄虚的巫医。他不是个例。虽然有夸张的风险，但我观察到的导师有两种：第一种是花衣吹笛手（Pied Piper），他们渴望得到认可，认为指导就是布道；另一种希望不承担教学工作，以用更多的时间做自己的研究。前者是劳碌的牧师，后者通常是机会主义者，觉得教学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教学不受重视，课程变成了政治皮球，而学术圈在描述自己业务时用词的自夸程度却达到了空前水平。在广告技术的操纵之下，“卓越”、“深刻”、“有益人生”这样的词嵌入了大学生活的语汇。它们仿佛在告诉青少年“在大学你就能完成自我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家长怎么告诉他们家翠花或者狗蛋“你不是上大学的料”？大学经历从一场仪式降为了一种权利。与此同时，教育经历被扭曲成了一种拯救世界的经历。学生开始被要求解决专家都无法掌控的问题。

在毕业典礼上，大学校长用集体自负和欺骗告诉列席的家属，这一届学生已经准备好与饥饿、核扩散、流离失所、环境污染、疾病、绝望、城市衰败作斗争。他们说，这些年轻人能做的事，实际上是无限的。当然大多数学生不相信，也不会按照这套夸张的说辞行事，但如果校长们能这么说的话，这会是一个喜人的改变：“我可以确认，这些毕业生阅读了经典文本，可以完成有条理的论文，可以作出合逻辑的判断，理解科学基本原则，能说一门外语，也知道历史上的主要事件。”但这些说法与现在通行的夸张相比，过于平常了——幻觉才是最重要的。

xv 在这类幻觉控制下的大学，攫取所有开设新项目的机会。巴尔赞教授所谓的“巴别指数 (Babel index)”背后，指的就是按照金钱和荣誉的回报来行事的诱惑。面对这些花言巧语，大学无法开设独立课程。它通常由对社区的参与和所得外在奖励的水平来衡量。

金钱和名誉的诱惑不仅影响着作为法人团体的大学，对教授来说也是极难抗拒的。西方世界里，很少有全职教授放弃通过咨询、指导或写作挣钱的机会。每名总统候选人都会跟他雇用的学术智囊团一起巡游。学术人员与大学以外的世界达成了一种妥协，使得教授这种职业的期待、任务和忠诚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从教学上偏离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很大程度上是教授进退维谷的结果。

在进退维谷的大背景和对少数几个金主的服从之外，优秀教学和学术的标准也是模糊的。好的教学必须是激励学生的技艺吗？这符合那些宣传政治或社会正统观点的人设计的普罗克汝斯特斯之床 (Procrustean bed) 吗？好的教学和流行度有关吗？学术是由发表文章数量和相应期刊的地位衡量的吗？最重要的是，谁是裁判？在有名与否至关重要的环境下，出现了太多肤浅的评判，而不很显眼的贡献，比如设计精良的讲座，对学生的关心，和对论文细致的评分，却被忽略了。因此毫不奇怪，大学同事这个共同的纽带在金钱、自由时间和名声之前不堪一击。

在教研员的日程上最重要的莫过于终身教职——这个制度扎根于高等教育之中，以“让教授不受思想控制”。终身

教职是颁给教授的自由宪章，同时也是制度上的赌博。如巴尔赞所言，大学赌这些“青年才俊”不会“成为无趣的老人，常年接受支持，哪怕到了支持不起的岁数”。高等教育中的财政变动，正在迫使人们小心地重新审视这个曾经无比神圣的制度。然而，重新检验终身教职制度还有另外的原因，这是巴尔赞在对此问题做清晰的分析时无法预见的。

传统看法认为，大学维持着西方文明的两个不同但不无关系的理念。首先，它所传授的智识方法的理念，摒弃教条、正统、阴谋论的模式，支持包容的实证主义，重视世界的复杂性。第二，它从根本上表达着对自由社会之价值的欣赏，尤其是对个人，对个人自由之理念，以及对其衍生的宪政民主的重视。因此，大学经历就有了双重特征，它既是接受智识训练的过程，又是社会化的过程。 xvi

然而，这种观念却和全新的、激进的渴望所设想的大相径庭。虽然后者与传统模式一样，也受到终身制度和学术自由的保护，但它们在方法论和本质上都是完全不相容的。带着各种极权主义观念和千禧年式的期待，它的信徒很难对开放对话和分析过程表示赞同，因为它们不能保证得到期望的结论。波士顿大学前历史学教授霍华德·齐恩（Howard Zinn）曾说过：“在一个正义分布不均的世界里，没有所谓的‘中立’或者对事实的陈述。”在这样的观念里，客观事实只不过是当前的规定或者未来的要求。

新学术的组织原则源于其目的，而非其方法或理论。其目的则是对文化、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不懈的攻击。这种学

术的出现就是为了证明已知的事物，换言之，即是对学术的直接反对。

这种系统性的“占领文化”[借用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的用词] 行动的盟友是终身教职制度和学术自由。如今的课堂经常被用做民族和阶级斗争的场所。不久之前，大学还是一个协调社会阶层上移人员，整合美国社会未来领袖的途径，但现在，有大量的教授力求做相反的事，他们助长政治和文化的对立和疏离。终身制和学术自由在狂热的革命预备队员心里，从对抗外在压力和操纵的机制，变为了帮助他们

xvii

的制度。

我不同意巴尔赞教授的一点是，他断言“(对学生) 智识启示的减少部分是因为高中的进步及其对许多通识教育内容的采用。许多大学现在给新生的感觉是重复原来学过的内容”。这些话和我的经历并不相符。我不仅认为高中没有进步，恰恰相反，根据我对新生的评估，SAT 成绩（这是中学方面问题的一个表面征兆）在前 20% 的人数自 1963 年起就开始下降。

根据我的判断，在狂热的 1967 年到 1973 年期间，促使学生组织骚乱的是无归属感。战争、征兵、对社会实验的渴望、离婚率的激增交织在一起，引起的是激进主义而不是思考，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搜集证据，是行动而不是反思。大学从学习中心变成了巴黎公社。

回顾这段时间就能发现，学生在高中受到的教育没有帮助。这个年代的课程实验创造的一代人没有接触过基本的文

化线索，甚至不知道关于政府和历史的粗浅常识。如小切斯特·芬（Chester Finn Jr.）和戴安·拉维奇（Diane Ravitch）的《十七岁的人知道什么？》（*What Do Seventeen Year Olds Know?*）在大量测试后发现的那样，答案是“不知道什么”。突然进入大学环境后，这些甚至不知道美国革命发生在法国革命之前的17岁学生，很快就被乌托邦的幻觉所控制，成了思想正确的革命者。这些美国高中教育的产物不通过学习、推理和总结的过程形成观点，而是通过成见（*parti pris*）进行判断，仿佛他们呼吸的空气里面飘浮着答案，或者有什么同轴电缆传送着图像。

巴尔赞有一个论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即学生被“束缚在取仕系统（*mandarin system*）之中”，必须获得学位才能得到专业职位。因此学生被迫忍受糟糕的教学和其他种种过失。某种程度上，往日的激进学生没有充分理解，现今的学生则确实不理解这一点，即他们通常是受害者。然而这并非，也很难说是校内骚乱的原因。

60年代末的学生激进分子典型现已被另一种不同的，更

xviii

毋庸置疑，在60年代及其后学生取向的变化这个问题上，巴尔赞教授很有见地，然而最能体现他睿智的地方可能是他对大学管理的论述：他认为大学管理层“既是上级，又是下级”。担任管理职务20年，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为教研员工服务，而我有限的影响力则来自于我对劝说的巧妙运用。我无法通过地位施压，因为在愈发平等化的大学里，地位差异并不存在。我只不过是由校长、副校长和其他院长组成的团队成员之一，我们同时致力于实现一个我们都理解并接受的目标，以让学校社群能够时不时地前行，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只能辩论、思考、检讨和质疑。

如今，院长职务包括用拨款抚养教研员工，基金支持，中央管理层授予特权，并逐条评估政府规章和最新的管理文件会对其工作产生何种影响，巴尔赞将之称为“智力促进(intelligent facilitation)”。院长既是行脚大夫，又是经理，既是执行者，又是翻译，既是筹款人，又是炼金术士。他必须协调教研员、学生和校友之间天然的对立情绪，以保持学院不分崩离析，同时自己还要有高涨的兴致，以确保他的管理中能体现出信心。

也许高等教育界最显著的变化，是原来只需要注意自己的学生和津贴，基本上万事不求人的教授，突然被置于完全不同的环境之中，而新环境中的专业分化、条条款款和各方利益冲突让他不得不依靠别人，尤其是他的院长。说到底，
xix 教研员工不希望管理学院，除非他们认为管理决议会危害到他们教学和研究的特权。巴尔赞不无见地地说：“他（院长）